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

宋学智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学新论丛书

I046

6

2006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

——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

宋学智 著

本书由扬州大学出版基金立项资助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宋学智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7-5327-4148-6

I. 翻... II. 宋... III. 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
中国-研究 IV. ①I059②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38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
——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
宋学智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250 册

ISBN 7-5327-4148-6/H·763

定价:2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628900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 编

2006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1
----	----

第一章 翻译文学经典的诞生与传诵	/23
-------------------------	-----

第一节 第一次译介高潮与敬隐渔的《若望克利司朵夫》	/25
---------------------------	-----

第二节 第二次译介高潮与傅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	--

第一册面世	/38
-------	-----

第三节 第三次译介高潮与一部完整的翻译文学经典的 诞生和传诵	/47
-----------------------------------	-----

第二章 翻译文学经典的再生、遭受抵抗与重现辉煌	/75
--------------------------------	-----

第一节 经典——不灭的地下火种	/77
-----------------	-----

1. 经典的重译及其他	/77
-------------	-----

2. “拷问”经典	/81
-----------	-----

3. 风雨中的经典	/96
-----------	-----

第二节 经典的重现辉煌	/110
-------------	------

1. 经典的重印及其他	/110
-------------	------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2. 为经典正本清源	/114
3. 经典:多维透视下的热点	/125
第三章 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	/143
第一节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茅盾和胡风	/145
1.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茅盾	/145
2.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胡风	/149
第二节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路翎及其他作家	/153
1.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路翎	/153
2.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其他作家	/161
第三节 罗曼·罗兰与巴金	/163
第四节 罗曼·罗兰与鲁迅和梁宗岱	/169
1. 罗曼·罗兰与鲁迅	/169
2. 罗曼·罗兰与梁宗岱	/172
第五节 千万读者心中的经典	/173

目
录
Contents

第四章 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	/185
第一节 文学翻译个案研究	/187
1. 敬译与傅译的对比分析	/187
2. 永远回响的“江声浩荡”	/194
第二节 翻译文学的思考与探索	/220
1. 从傅雷译论谈翻译文学	/220
2. 译者与作者的共铸	/226
3. 原语与译语的双边发展、作者与译者的 历史奇遇	/230
4. 赤子之心的呈献	/234
5. 翻译文学的审美胜境	/238
第三节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当前译界的“巡礼”	/245
1. 对当前翻译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的回应	/245
2. 对当前翻译理论中的重要问题的回应	/254
3. 对当前翻译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的回应	/265

目 录
Contents

结 语	/277
-----	------

参考文献	/286
------	------

后 记	/296
-----	------

绪 论

“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各师成心，其异如面”^①。作文如此，译文亦如此。看今日译坛，已经面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汉译，少说已有七、八种，加之缩译和编译的种种版本，数量又可翻番。在众多译本中，翻译的质量自然参差不齐，属于上品的全译本，当是傅雷、许渊冲和韩沪麟三人各自的译本。简单地说，傅译饱含激情，许译生动洒脱，韩译平实有度。然上品之中，亦有上上之品，那就是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说既不是主观臆断，也不是个人偏好。就连许渊冲自己也承认，在“20 世纪的世界文学名著中，最能引起一代人共鸣的，可能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了^②。柳鸣九明确说过：“在中国，凡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几乎无人不晓，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是这部作品热烈的赞美者、崇拜者”^③。两位学者谈及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无疑是指傅雷先生的译作。确实，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广大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影响，从其普遍性、深刻性和持久性来说，远远超过其他的外国文学译作。凡对外国文学与翻译略有一二了解的人都知道，罗曼·罗兰与傅雷，一位是因“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与真实性”而获得 1915 年诺贝尔奖的文学大师；一位是“以卷帙浩繁、技艺精湛的译品而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一两位的翻译巨匠”^④。一位是热情地向“中国的弟兄们”伸出手来寻求友爱和沟通的西方睿智的“世界公民”；一位是立志要从法兰西

① 刘勰，《文心雕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82 页。

② 许渊冲编，《罗曼·罗兰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年，编选者序第 1 页。

③ 柳鸣九，“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1 期，第 273 页。

④ 同上，第 270—273 页。

擎来“灵魂的火焰”以驱散阴霾挽救一个萎靡民族的东方赤诚的知识分子。东、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傅雷与罗曼·罗兰两位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的大师,提供了一次彪炳翻译文学史的灿烂奇遇。两人在互通信函后不久,傅雷——这位可以说与罗曼·罗兰具有旗鼓相当的艺术造诣的翻译家,便把后者的 *Jean-Christophe* 创造性地翻译、整合成了一部能广泛地、强烈地和深远地震撼中国读者灵魂的翻译文学经典。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具有的巨大影响和不朽的艺术生命,构成了本文选择它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

绪
论

在从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 1937 年出版至今近七十年的历程中,罗兰的“作品是这样广泛持久地吸引着中国读者,特别是一批又一批广大青年读者”^①。民国四十年代,在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下,它曾引起万人空巷的争购传阅;新中国成立后,它很快征服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心灵,不久,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左倾的政治运动中,仍然成为不灭的地下火种;改革开放伊始,它又随着文化开禁的春风,再度燎原,风靡于广大新老读者中间,进入“八十年代十大畅销书之列”^②。这些情况既构成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传播、影响的主要脉络,也成为我国翻译文学史上一道罕见的景观,对此有必要进行梳理和考察、总结和分析,以便更好地掌握、了解翻译文学特有的现象、品质,认识其独立价值,把握其研究方向。“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作家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位能像罗曼·罗兰这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期内不断受到中国读书界从各种意义上的关注。……回顾近四十年来我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评论,人们为这本书所花费的笔墨,比起任何其他现代西方文学作品,堪称

① 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36页。

② 罗新璋,“傅译罗曼·罗兰之我见”,傅敏编,《傅雷译罗曼·罗兰名作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代总序第3页。

首屈一指”^①。二十年前的论者如是说,让如今的我们愈加认为,这项梳理、考察和研究的工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不仅仅因为至今尚无人在做这方面工作的缘故,而主要是因为这部皇皇巨著在中国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和我们已取得的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之间,还很不成比例,很不“和谐”。目前这种研究现状,正说明了本文选题的意义。

在传统观念里,翻译文学的概念与外国文学的概念是完全划等号的,因而,对一部翻译文学作品的研究,一直被当作是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所以,要考察一部翻译文学作品在我国的传播、研究和接受,通常被中文专业的学子视为是对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所进行的研究,因而会被他们自以为是地视为属于他们的学术研究范围,比如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那么,外语专业翻译研究方向的学子选择这样的论题,是否有不安分守己、越俎代庖的嫌疑?这是在开始论题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过去,多数人对这一问题似乎还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恐怕只是以翻译的跨学科性来做解释的,而这种解释其实是模糊的,因为这仅仅是用翻译的实践层面的无所不包代替了其理论层面的无所不包,并没有真正从翻译的理论层面去认识和思考。现在,正当此类研究越来越引起外语专业翻译方向学子的热情的时候,很有必要对我们自己的这项研究,进行学术合法性的论证。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等理论兴起,西方翻译研究在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放开了视野。从翻译活动的跨文化特性出发,西方学者深刻地意识到了“翻译已经成为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②。

① 李清安,“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读书》,1989年第2期,第66页。

②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 12.